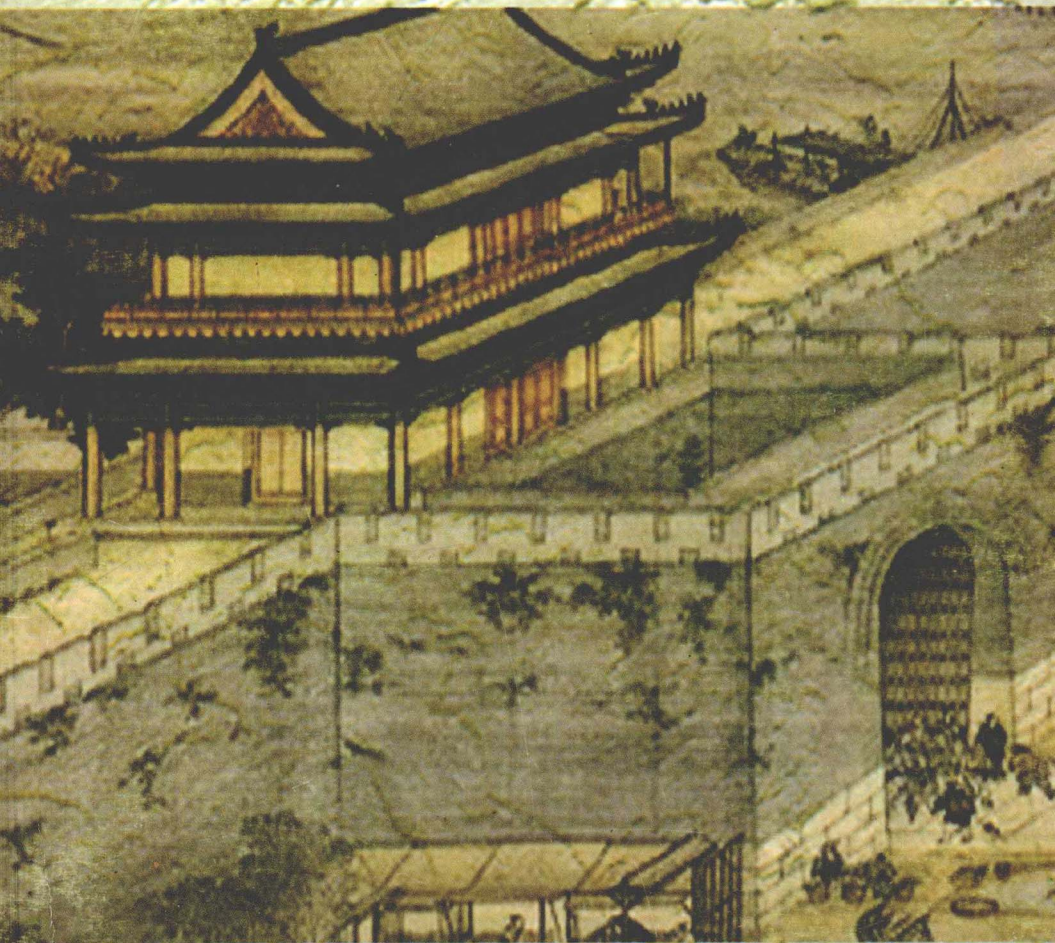


廣漢文史

第十八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汉市委员会编

开创文史工作新局面

蔡松柏

2003年春天,广汉市政协迎来了换届选举,第十二届委员会应时而生。新一届领导班子和诸位委员们,和衷共济,锐意进取,在党的“十六大”精神鼓舞下,学习贯彻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发挥政协的特点和优势,认真履行职能,建言献策,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潮中,推动政协工作不断向前发展。

政协文史工作,已经被写入政协的《章程》中,因为它具有“存史、资政、团结、育人”的功能。我们认识到《广汉文史》是政协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。回顾广汉政协的历届情况,共计编印文史资料十七辑,发表文史稿件四百余篇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汉的历史轨迹、人文景观、风土民情,受到群众好评。而今,我们有责任把文史资料编辑得更好些。在中共广汉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,我们决定在原有基础上,发扬成绩,克服缺点,再接再厉,适应时代要求,开创广

汉文史工作新局面。

如何开创文史工作新局面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。我们设想必须提高对文史工作的认识，加强领导，进一步广泛深入发动群众，组织写作队伍，拓宽稿源；同时认真编审，注重整理设计，精心编校，不失众望。除继续编好综合性的文史资料外，还拟编辑神秘三星堆、广汉旅游、广汉名人、教科文卫、农业经济、工业生产、交通邮电等几个方面的文史系列，希望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都来关心支持这项工作。我们寄厚望于各部门、各单位和各乡镇同志，加强宣传你所在单位的今昔变化，经济建设成就、精神文明新风尚。

要把广汉建成文化旅游名城，建成世界级的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，文化事业不能滞后，《广汉文史》义不容辞。

《广汉文史》第十八辑与大家见面了。我在此感谢市委、市政府，感谢有关单位；感谢诸位作者。

2003 年 12 月 25 日

目 录

· 改革历程 ·

广汉农村改革溯源	常光南/口述	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

· 史事钩沉 ·

西汉雒县在东汉末移治今广汉雒城镇	叶城文	21
郑躬起义及其传说初探	罗 南	24

· 往事回眸 ·

广汉邮电业回顾	冯曰明	28
坡陀岁月	张祖泽	38
广汉农业合作化进程	李春生 何雅宜	60
忆公共食堂	何雅宜	72
农村大跃进记略	陈家映	78
漫忆杂叙话文革	张 隐	85
文革中的点滴事	陈家映	113
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点感受	向 杰	118

· 人物春秋 ·

张氏祖孙三代十举人·····	张白帆	122
舅父安硕朋烈士遗事·····	何春松 何春林	135
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——邓兴崇·····	何雅宜	139

· 广汉机场 60 年 ·

守望蓝天的银鹰 ——广汉机场六十年回眸·····	徐星华	145
修建广汉机场记事·····	於笙陔	153
特种工程二三事·····	向 杰	158

· 文苑艺坛 ·

吴家寨子·····	向 杰	167
连山评书·····	谭德贵/口述 邬春亮/整理	171
略谈广汉川剧·····	廖尚全	176
李白的广汉之行·····	张白帆	180

· 附录 ·

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至第十七辑目录总汇·····	184
广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稿内容提示·····	206
编后留言·····	211

广汉农村改革溯源

常光南(口述)

我从1949年随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南下入川,就一直生活在川西坝子这块土地上。我是河北邢台人,1947年参加的人民解放军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,我从彭县县委副书记调到了广汉当县委副书记,“文革”中靠边站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任县委书记,直到1983年德阳建市时才离开广汉到德阳当市长。在广汉呆了17年,留下最深刻印象的,还是农村改革的年代。

关于广汉的农村改革,一个是金鱼公社(现为金鱼镇)的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,一个是向阳公社(现为向阳镇)摘牌,这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两件事。我就谈谈这两件高兴的事。25年前的事情,有些记不太准确了,我翻了一些笔记本,回忆起了一些情况。

一、金鱼公社建立联产责任制的起步

关于包产到组这件事的起因,记在我的笔记本上。1977年10月10号上午,天下着雨,县委召开扩大会议,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——那时候叫华国锋主席、邓小

平副主席的讲话和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讲话精神。这个会上一共分三个问题讨论：第一个呢，是以整风的精神围绕工农业大上的问题；第二个呢，是总结过去工作中的问题；第三个呢，是讨论下年工业农业咋个搞，大概是这三个问题。在讨论到农业大上的时候，我提出来在农村了解的是西高公社（现为西高乡）的情况：有一天我转到那儿，我记得是五大队（现为金光村）的一个生产队，那儿生产相当好，水稻、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，要高一些。我问一个老头儿，这儿生产咋搞得那么好？他看着我而不回答我的问话，只叫我问晒坝里的队长。我就到晒坝里面去问这个队长。他是个副队长，当时他也不说实情，只说他们肥料多嘛，说一些官话。后来我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常光南，县委书记，来总结一下你们生产好的经验，说是来学习的、总结的，他才说了实话：是把生产队分成了三个组，包产到组，人分了、土地分了、任务分了，其他的跟着走——什么猪呀、牛呀都跟着组走。

在县委扩大会上，我就把这个情况介绍了一下，会上讨论得相当热闹，有的公社党委书记说，如果你常书记同意我们这样搞，包产到组，一亩田就能增加一百斤，如果增加不到一百斤，撤我的职；有的说，这个办法只要常书记同意，同样的肥料，同样的人，我们广汉粮食就会来个大丰收。反正会上讨论得热闹得很。有的同志提出来，你说的这个“包”字咋敢搞呢？是不是“定产到组”，我说对。后来我们是全县搞定产到组，都定了。散了会以后吃饭的时候，有的同志就说这个“定产”跟“包产”是一回事。我听了心里有点虚，这个事批了几年了咋敢搞呢？我就叫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夏更坤（昨天晚上我还给他打了电话核对情况）到省上去请示，他就跟陈继

银两个人跑到省委找到杨万选书记。①万选同志当时的分工是农村工作。夏更坤给他汇报了当时会上的情况,准备搞包产到组。万选同志指示,可以搞试点。

夏更坤回来给我汇报了过后,我们是不敢在全县范围搞了,就准备搞一个点。因为省委万选同志既没有说在大队搞点,也没说在一个公社搞点,我就想,既然同意搞试点嘛,就在一个公社里搞,其他的公社暂时不搞。

县委扩大会议以后,紧接着岳忠同志②来了,他是到北外、西外、中兴公社搞农村调查的,那时候叫基本路线教育调查。我就跟他说,我们全县搞包产到组,虽然万选同志说了搞个点,但我心里还是不服气,想全县搞,想通过给岳忠同志汇报,看能不能同意我们全县搞。岳忠同志就说,我倒好说,我到时候就走了,你是县委书记,将来脱不到手是你的事情,还是搞个点。我们在院坝里争论了好久,我才按照万选同志的指示精神去搞个点,就定在金鱼公社③。

搞金鱼公社这个点的事情,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很积极,对这个包产到组积极呢?我想,粉碎“四人帮”过后,人心大快,我也很高兴,特别是领导叫我当县委书记,组织广汉县委这个班子,当然我这个心情又高兴又觉得担子重。还有一个呢,我觉得,我在基层搞了几十年,工作没有搞好,群众还贫困,不富裕,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很困难。我想川西坝子过去说的是“天府之国”,广汉又是川西的一部分,条件这么好,水利这么好,气候这么好,土壤这么好,自然条件这么好,不富裕是我们的工作问题。农民群众也在想改变贫穷面貌,天天盼富裕起来。我也天天都在想,咋个能把这个工作搞好。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,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精神,叫解放思想,那个时

候就提出来了,是传达的(今天早上我翻我的记录本),其中就有:要解放思想,多想门路,多想点办法,把经济工作搞上去。中央领导叫解放思想,省委书记的讲话里面也反复地讲,要解放思想,把农业搞上去。群众当中有部分就偷着搞包产到户,金鱼公社这个地方把河边、田坎、路边、空的地方都分给社员,庄稼长得都好,我看到农民种的自留地的庄稼比生产队的长得好。我在全县看了十几个公社,我都转完了,凡是我看到的河边、路边、沟边,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都相当好。为什么这个能长得好,生产队的却不能长得那么好?这是我之所以积极地要搞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的一个思想。过去没搞好,本来能给群众搞好,关键就看敢不敢搞。

学了中央领导的讲话,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,解放思想,省委书记也讲要解放思想,把农业搞上去,上面有精神,下面有经验,作为我来讲,很后悔过去没搞好工作,现在咋个想办法搞上去,所以就开会。这以前我就有思想准备,包产,包产到组,为什么全县不能像西高公社的那个生产队那样搞?为什么不能像金鱼公社那个河坝里面的庄稼,都长得那么好,比田里面长得好,原因是过去不敢搞,那么现在中央领导叫解放思想,多次讲解放思想,要把经济搞上去,这就是前提。要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呀,我说就是这个,中央、群众、我们县委的领导想法就结合在一起来了,下了一个决心,所以在金鱼公社搞点。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。

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过后,我们领导干部不挨批斗了,我主持县委工作当时也很高兴,但是担子又很重,我认为当时条件、政治气候已经可以搞了。有人追问我,你说你敢搞,为啥还要请示呢?当时我还是有点怯火,过去也是整怕了,我请示

了过后,将来遭了,我总请示过嘛,另外,我还有个组织纪律性嘛,组织观念比较强,要请示一下才好。

1978年10月初,金鱼公社党委就把这一年的包产到组情况给我画了一个表,一部分包了,一部分没包,一部分包得不好,把这三种情况,还有增产的比例,给我报来了。当时我就把上面的主要数字,用给省委写一封信的形式,把情况反映上去。正在这个10月初,温江地委决定在大邑县召开播种小春的现场会,参加的人是公社党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。我就把这个材料带至省上,那时叫省革委会,就在现在的省委里面。把这个材料送给了省革委副主任杨汝岱同志。他当时看了过后就说:啊!这个材料重要。他说要给省委书记汇报,他就走了。我也就走了,到大邑去报到开会。

就在报到的那个晚上,吃饭的时候,省委第一书记来了,和大家一块儿吃饭,他就对地委领导说,今天晚饭后开一个县委书记座谈会,你们地委的常委都参加。那时候地委书记是王德功。吃了饭过后休息了一会儿,就在大邑县县委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。省委书记坐在会议室的东面,我坐得离他比较远。他看到我了就说:“常光南,来来来,跟我坐拢来点。今天晚上常光南唱主角,你就把一个公社一年增产了五百多万斤的情况给大家作个介绍。”他开始说了这么几句。当然我就如实说:当时是请示了省委,搞个点,我就搞了个公社。酝酿中,省委副秘书长宋文彬同志带着工作组在这儿驻了一个多月。现在这个产量基本落实下来了。金鱼公社两万多亩土地,增产了503万斤,一亩田平均增加了两百斤还多点。我讲了这个情况,大家都很高兴,都议论开了,说一个公社才两万多亩土地,一年就增产了五百多万斤,不简单嘛。省委书记

乘势说：“你们大家讨论，大家都可以说，你们的看法如何？”这个会上讨论得热闹得很，12个县全部都发了言。我记得发言最积极的是灌县（现都江堰市）县委书记谢盛耀，还有邛崃县委书记李克耻，还有新都县委书记黄义元，新津县委书记王友昌，彭县（现彭州市）县委书记张中伟。我记得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办法好，都说该搞。王友昌还说这是广汉的创举，要搞。也有的同志本来认为这个好，这样搞粮食就可以增产，包产到组，明明他是想搞，他知道这个对，但他说这个都搞得啊？这叫分生产队的嘛。这就画了个问号了，我就对这个不太踏实。实际上这个人我了解，他回去后也是积极得很，一直想搞得很，就是被斗怕了，他不敢说搞，实际上他知道这个对。最后省委书记就在会上说了，其实一开头就说了，广汉金鱼公社责任到组，从方向道路上讲没有问题，想搞的可以推广，多搞，有的同志可以搞个试点嘛，成功了过后再推广。当然也讲了很多其他的情况，但是这个会上要害问题是在点了头了，说可以推广，我心里一下就放心了。这个小春播种现场会，实际上成了一个包产到组的会。

回县以后，我就召开大队的支部书记、生产队长会议，要在全县推广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杨万选书记来了，我记得他带着岳忠同志和省农业组一个女干部谢自均同志，还有秘书张继禄，来广汉搞调查研究，先在县上听了情况汇报，然后到金鱼公社去实地调查，整整调研了一个星期。那时正是金秋时节，稻子已经收了，从10月19号到24号，他们深入到大队、生产队的院坝、田间与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，一谈就是一个星期。走的时候，我看万选同志很满意，第一是他批准搞的点，第二他亲自

在这儿深入调查,看到大丰收了。我也很高兴,我都感觉到生产比过去好了。至于全县推广搞的问题,他说:大生产队可以搞,我负责;面上的要请示省委以后再说④。

当年就搞包产到组,过去我们喊定产到组,叫“三定”,定人员、定土地、定任务,任务就是定征购任务,比如这个生产队20万的任务,三个组,一个组里几万斤,实际上包产到组说的“三定”,核心是产量包了,当然,不定人咋个分呢?土地不定了咋个派任务呢?这个“三定”,产量是基础,是核心。

二、向阳公社撤社改乡的前前后后

包产到组搞下去过后,大队、生产队就空了。正在这个时候,省委第一书记到广汉调研了一个星期,我陪他在全县看了工业、农业、城市,到处看。在谈话当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离开广汉的那天,是个星期天,他在院坝里走来走去,问我还有啥子要说,我就说需要我说的我都说了,看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没有?书记当时已经提出来改革了,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机关呀,我们现在这个机构呀,钻到牛角里面了,回头都不好回,这个必须要改变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句话:一个是我们机构已经走向牛角里面了,死胡同;一个是说今后要改变这些行政单位,让行政单位都成为干爸爸,把企业权力扩大,中国才有希望。他在这个院坝里说的很多,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提出来改革。

他走了过后一段时间,那是1979年6月初,他的秘书通知我,说书记要出国,叫我也去,我当然很高兴。走的时候到省委金牛坝招待所报到,我就去看他。当时他问我农业生产如何,我说现在缺水。他当时同意我的看法,先把川西的好水田栽上,然后再往下输水。并当即给省委的一位领导打电话。

我们出了国后,他给我说了几回:常光南你出去过后,要关注两个问题:第一个你看人家农业咋个搞上去的;第二个你看人家那个领导的机构咋个组织的。那次杨汝岱同志也去了。到了英国以后,去了一个农主家里,农主就带着我们到那儿一个丘陵地方去,这边栽的葡萄树,那边长的草。书记就问人家:你这边是葡萄树,那边为什么尽长草呢?这山都是你的吗?农主说都是他的。他说这边阳光好,葡萄的产量高,质量高,含糖高,才能卖高价;那边就没得什么阳光,种葡萄含糖量少,所以就种草,养牛。书记回头就对我说,常光南,来来来,你来看,人家就晓得因地制宜,我们行不行哦?我说只要书记说一句话就行。他问广汉市有啥子特点?我说广汉嘛,栽菜籽就比点小麦划算,但那有任务,不完成那么多任务是不行的,层层下任务,省上给地区,地区给县上,县上给公社,公社给大队,大队给生产队,都分了任务的,不能变,不能因地制宜,叫你种啥你就得种啥。他就把汝岱同志喊到跟前说,这个问题你跟光南同志商量一下。我就提出来,我说菜籽种植面积能不能给我们13万亩,给我们分配的是8万亩,我们要求少种5万亩的小麦,多栽5万亩的菜籽。书记说可以,并问汝岱同志看行不行啊?汝岱说,只要书记说行就行嘛,就这样定了。

我为啥说这个例子呢?就是说人要务实,看了人家搞得对我们就是要学。回来过后,我们马上就调整了5万亩麦子种菜籽,所以第二年1980年,我到东北、到山西用1斤菜籽油调7斤玉米,就做起了生意来了,群众很满意。这里面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,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。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行政机构的权力弄小点吗,这其中就有这个问题。书记到一

些公司里面看人家咋个管理,他说人家那个厂长经理,又是采购又是厂长,又是技术员,你看我们好多人,行政人员弄那么多。他说你回去,把你们那里按照这个改一下。当然他在那儿说改的还多,包括说你常光南爱人没有工作,常光南就聪明,你看人家,外国人好多夫妇人家能享受,我们则是高就业,两口子都在工作,工资都低,都忙得不得了,你常光南回去把这个先在你们那儿改一下,两口子一个人工作,那个人工资照发,这个人多发点奖金。我回来也搞过,但妇联就反对,没搞成。

1979年6月,出国回来后,才到了向阳公社搞点。为什么第一步在向阳搞公社的牌子呢?我在向阳公社碰到党委书记叶文志,他吃了饭跟我一起转,在场口上碰到一个老头,这个老头眼睛红红的,我问:大爷,你眼睛咋个那么红?他说,嘿,你问他,叫我问那个书记叶文志。于是我就问:老叶,他咋个的呢?老叶说他是酒厂的厂长。那老头也开始说了:叶书记给我分的五万块钱的上交任务,我为了这五万哪,好多晚上睡不着觉,不能睡觉,我太紧张,我的责任重大啊,我还想超个一两万,大家再分点嘛。我说我几年想了好久的办法,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,我们现在当领导的责任心还没有这个强,我看这个厂长责任心就强。叶文志就说,关键是要包哦!利益要挂钩哦!后来我跟叶文志说,你除了这个厂,其它有没有包的呢?他说三个厂都包了。沙石厂包了,还有个厂也包了,我都不管了,给我一年交好多钱,就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向阳搞试点的原因。农业包产向阳搞得好的,工业包产搞得好的,所以决定在向阳搞。

这时全县的生产队基本上都包产到组了,一部分包产到

户。这个时候公社的体制叫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，这个“三级所有”也停下不动了。当时公社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就有点看法。我们就打算组织一个跟人家外国学的好办法，成立一个董事会，刚开始成立一个农业公司，管农业，包括种子，包括防治病害，包括技术。后来又把供销社作为基础，把街上这些商人组织起来，成立商业公司。还把公社的工业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业公司。三个公司组织起来过后，又成立农工商联合总公司。这个总公司受谁领导呢？最高领导当然是共产党。不过这要发扬民主，那时候叫官办改民办，选董事会，说谁股份大，谁当董事长，股份第二就排成第二，叫董事，一直往下排。我后来给省委第一书记汇报了，说我们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，农业公司、工业公司、商业公司，还成立了个董事会，把官办改成了民办，谁的股份多，谁当董事长。书记说，你这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。意思是谁的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，他说外国也不一定是这样。他笑了，说可以，你们就这样定。他批准了，我们就更大胆一些，继续搞。

这样弄呢，都去搞这个董事会，搞农业的搞农业，搞工业的搞工业，搞商业的搞商业，这个公社就空了，成了空牌子了，架空了，平调粮食，也没得了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，基础没得了，瓦解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咋个办？我们就采取了公社光挂牌，实际弄了个行政组，这边是农工商联合公司，那边是行政组，分了两大块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走到了牛角里面，死胡同，我想把这个行政单位搞成千爸爸，公社就少干扰，没得这个权了嘛。行政组是管什么的呢？就是政府的那一套，行政方面的那一套。大队改成村，生产队改成居民组，行政组下面就管村，村里面就管居民组，把

这一套树立起来了。这个行政组没得权力,就成立一个政府嘛,我就提出来把行政组改成乡公所。我查了记录本上是这样记的。

原省委第一书记要调国务院去前的 1980 年的 3 月 30 号上午,通知广汉的县委书记去成都谈改革的事,我和县委副书记夏更坤、霍世英、叶文志以及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五个人,去了金牛坝招待所,我记得省委几个书记都参加了。会上离任书记一开始就说,他要走了,到北京了,广汉这个试点要继续搞下去。后来他就点我常光南,把想法再给大家说一下。我就说到一个体制问题,说我们向阳这个试点,已经把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起来了,另外想把行政组改成乡公所,才有权力,行政组没有权力,过去政府、企业都是公社一把抓,我们想把它分开,这边是乡公所,那边就是联合公司,也就是说这个管行政,那个管经济,分个工。当时离任书记说,我看可以,搞个试点嘛!搞一个乡嘛,问题不大,就是有问题嘛,将来也好纠正嘛。他给新任第一书记谭启龙以及其他几位书记说,让他们搞个点吧。当时其他同志都点头说可以。

由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,进一步发展深入,把这个“三级所有”打乱了,把公社架空了,然后就往政经分开发展,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,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,逐步就分开了。从省上回来过后的第二天上午,县委开了个会,专门研究向阳改革的问题,当时县委意见都比较一致,都同意这个办法,既然省委同意我们就搞。

前面我说了做生意的事,1980 年的 7 月 30 号我就出发到东北吉林去做生意。为什么我到东北长春去呢?吉林的省长张根生从广东调到东北去工作,国务院领导问他怎么开展

工作,就说可先到四川看一下,特别要到广汉,所以张根生就带着他的全部厅长,大概二十多个人,到广汉住了一个星期,看了广汉的情况,走的时候喊了两个人跟去,就是介绍咋个实行定额、包产。张根生在广汉时就同意我们的菜籽换他们3000万斤玉米。为什么调玉米呢?调玉米回来我们可以烤酒,广汉烤酒的多,糟子可以喂猪,猪多肥多,当然生产容易搞好。所以张根生同意给3000万斤玉米,叫我去一下。我去了给张根生省长汇报了,省委常委讨论了,同意给我们广汉3000万玉米,全是国家牌价,我很高兴。这个时候,国务院的领导恰巧也在那儿,传话说晚上叫我去,我就去了,吃了晚饭过后就在南湖宾馆里面转,他叫我汇报广汉的改革情况。当时大概是晚上的8点钟,一直谈到将近10点钟,大概一个多钟头。其中就谈到关于公社的这个牌子的问题。走的时候,他问我还有什么说的,我说没得了,都说完了。他问,群众有啥反映呢?我说就是对这个公社反映大。他说,你的意见呢?我说我的意见是把公社的牌子取了,换成乡政府。我这时就没有说乡公所了,这个是县委常委讨论了的。因为这个政府权力才大,在群众中威信才高,工作才能搞好,这是常委讨论的,所以在那儿我汇报就提出改成乡政府,公社的牌子取掉换成乡政府的牌子。他说:“可以的嘛,势在必行”。这句话说得重——“势在必行。”回到县上过后,我就给常委说势在必行,推着你搞嘛!在金牛坝招待所时就同意搞,现在又说这个事情,推着搞,快点搞。

关于这个向阳摘公社牌子的具体时间呢,现在各说不一,有点乱,这肯定是1980年8月份。8月6号我从长春回来的。开了县委常委会议过后,很快到了向阳。到向阳去的有